

亞洲商業網絡(1850-1930)會議

林 滿 紅*

一、第十一屆世界經濟史大會之會前會

世界經濟史大會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成立於1959年。每四年召開一次。至1994年，已是第十一屆。此會秘書組設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歷史研究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大會則分別在歐洲斯德哥爾摩、慕尼黑、列寧格勒、哥本哈根、愛丁堡、布達佩斯、魯汶等等大城市輪辦。第十一屆將於1994年9月在米蘭舉行。

這個以歐洲為主體的經濟史大會，事實上是經濟史方面最大的國際聯合會，連美國經濟史學會也是它的會員。以第十屆在魯汶召開的大會為例，報名參加的世界各國學者有一千三百人左右，連同眷屬，則有兩千多人。經濟史方面的重要理論，如至今仍影響頗深的 Simon Kuznets 的國民所得與現代經濟成長理論，Fernand Braudel 的整體歷史研究理論，都以此一大會為重要影響據點。1993年以經濟史研究得諾貝爾獎的 Douglas North 也在1990年魯汶經濟史大會的方法論研討小組之中。

經濟史大會所提出論文的性質，在1990年以前，屬方法論者約佔10%，屬古代與中古時期者約佔30%，屬近代者約佔60%，而近代部分論文所佔比例有越來越增加的趨勢。

世界經濟史大會自1959年成立以來，主要是西方學者討論西方經濟史的學術會議。在最近世界快速重新整合的背景之下，大會也越來越將亞洲、非洲的經濟史納入討論。在將亞洲史納入討論的過程中，日本的經濟史學者貢獻良多。就1990年的魯汶大會來自亞洲的參加者來說，東南亞學者有1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亞洲商業網絡(1850-1930)會議

大陸學者有2人，臺灣學者有3人，印度學者有9人，日本學者則有56人。已成為大會委員會之一委員的速水融自1970年代起即將日本德川時期的歷史人口發展與經濟史介紹給西方學者。角山榮、濱下武志、川勝平太、杉原薰、杉山伸也等學者則試圖在此大會中指出晚近崛起的亞太經濟有其歷史根源——亞洲內部原有根深蒂固的商業網絡。

繼1990年已有一場相關研討會提出於大會之後，1994年又有兩場。此文所報導之「亞洲商業網絡(1850-1930)會議」即為其一。由於經濟史大會中討論的場次甚多，以第十一屆大會為例，即有A、B、C三組共76個場次。每個場次在大會之中多只由幾位教授報告要點，而後由有興趣的大會參加者就原已發出的論文加入討論，由提出論文者提出答辯。而於大會召開之前，每個場次都需另外召開一個會前會，就該場次所提出論文，由論文提出者進行較密集的討論，以便印出論文集在大會流通。「亞洲商業網絡(1850-1930)會議」這一個會前會係由日本慶應大學的教授杉山伸也召開，於1994年3月17至19日在日本東京近郊最有名的溫泉區——熱海的赤根旅館舉行。

二、會議目的與參加者

所謂商業網絡，包括商品流通的路線與工具，從事商品流通的商人的資金來源和融貸對象，商人與其部屬，與其他商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杉山伸也教授召開此次會議的目的有三：

- 1.就十九世紀中葉至1930年代，亞洲內部的商品流通及金融網絡進行個案研究，並考察其經濟史的意義。
- 2.以往的歷史研究常以國別史劃分畛域，此一會議企圖打破國界的藩籬，而以亞洲為一區域，指出近代以來亞洲內部各地區之間的交流。
- 3.以往經濟史的研究側重生產方面，最近稍稍注意消費方面，但如最近美日談判所呈顯的，流通部門亦極重要，此次會議因而擬側重流通部門之歷史探討，並由之吸取若干啟發。

在這些基本前提之下，被邀請參加此次會議的學者，有日本、中國、朝鮮、西亞、東南亞等國或地之經濟史學者。日本經濟史學者除杉山伸也之外，另有名古屋市立大學之籠谷直人、東北大學之谷本雅之；中國經濟史學者有美國康乃爾大學之 Sherman Cochran，香港嶺南大學之霍啟昌，日本

東洋英和女學院的古田和子，上智大學的 Linda Grove，東京大學的濱下武志，和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林滿紅（林也研究臺灣經濟史）；朝鮮經濟史學者有日本東京農工大學的木村健二；西亞經濟史學者有慶應大學的坂本勉；東南亞經濟史學者有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 Ian Brown。

三、宣讀論文

會議議程詳如附件所示。各宣讀論文大要依宣讀順序為：

坂本勉之「近代伊朗絲貿易網絡」指出伊朗在 1830 年代後半至 1840 年代對西方開放通商口岸之後，其出口貿易中居舉足輕重地位的絲出口貿易（1864 年高達伊朗出口值之 84%，佔世界絲產量之 38%）的輸出路線及輸出商人的變化。主要產於裏海南邊的生絲、蠶繭，開港前原多由裏海轉經陸路出口至歐洲，出口商人為回教徒的亞美尼亞商人。開港後先因有蠶瘟，生絲出口地位漸為地毯、煙草所取代，再因改由伊斯坦堡經黑海出口之生絲可藉汽船載運，又因伊朗欠歐洲債務，生絲出口用以還債，在歐洲與伊朗間居中介地位的希臘商人（基督徒）遂取亞美尼亞商人而代之。

籠谷直人「1896 至 1936 年間東洋棉花公司與日印棉花貿易」主要利用大阪市立大學所藏的該公司檔案研究其在日印棉花貿易中的經營方式與利潤變化。東洋棉花與日本棉花、江商合稱當時日本從事印度棉花貿易的三大公司。三大公司劃定領域逕入印度中部購買棉花，以東棉而言，直購在 1920 年代，佔約 50%。1920 年代東棉之利潤亦豐，但至 1930 年代，因印度商人起而代之，逕銷棉花至日本，東棉在印度之購棉生意轉趨不利，遂轉而致力於荷屬印尼之棉製品貿易。

谷本雅之「日本的英國棉紡織品進口商」指出日本在 1858 年橫濱開港，1867 年神戶開港之後，因茶、絲出口獲利，棉紡織品的進口增加率大於中國，英國棉紡織品進口值佔總進口值之 30-50%。棉紡織品之中，1870 年代以前棉布進口居多，1870 年代至 1889 年以棉紗居多，1889 年之後棉花居多。此等新增加之棉紡織品進口締造了行會以外的新興商人。除了一些投機商人介入較短的時間之外，主要由貿易船的經理人轉成的批發商人則迭有更新，他們也是引進棉紗促成日本生產現代棉布來取代西方棉布的工業家。

霍啟昌的「香港華商的商業網絡」，以高家、馬家的私人商業信函、帳冊、年報為資料探討兩家國際商業網絡的拓展。高家於 1830 年代至泰國從事

該地之米及其他土產出口至中國的貿易，1850 年代因發現香港可為一貿易據點，而將主店移至香港，分店設在曼谷、新加坡，到第二、三代更設分店於神戶、廣州。馬家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香港之一大企業，事業延伸至北美之加拿大、舊金山、Sacramento 等地。兩家的商業網絡都靠私人關係拓展。馬家子嗣較少，屬下兩百多名員工多臺山族親。高家第一代育有九子，整個企業由此九子拓展。雖依傳統方式營運，營運項目則由傳統之米、土產貿易拓及諸多現代企業，如汕頭的銀行、電力公司、水利公司、棉紡織及香港的兩家保險公司、新加坡之橡膠公司。因為所從事之銀行業務極有信用，客戶樂於往來，加上兼營若干船運公司之代理工作，出入貨物甚快而少囤貯，獲益甚豐。但在九子之後，繼承發生問題，企業遂告衰弛。

古田和子之「上海——蘭開夏棉紡織品在東亞之一貿易據點」利用北華捷報 (North China Herald) 之週資料統計 1874 至 1893 年間英國蘭開夏棉紡織品透過上海之分銷情形。其分銷點包括漢口、鎮江、天津、牛莊、長崎、神戶、釜山、仁川等等。以 1870 年代之神戶為例，其進口之蘭開夏棉紡織品三分之一係由上海轉口。全文分 1874-78、1881-85、1886-89、1890-93 幾個階段統計上海各分銷口岸分銷蘭開夏棉紡織品比例的變化及各分銷口岸分銷量的相關係數。由 1874 至 1893 年間，持續約有四分之一再由漢口分銷，四分之一以下由天津分銷，15% 由鎮江分銷，其他再由其他各港分銷。華中、華北各港之分銷數量常互為消長，東北、日本、朝鮮各港之分銷數量與華中之分銷數量則較少關連。

林滿紅之「清末大陸來臺貿易商人（郊商）的興衰問題」相對於 1909 年至 1990 年間十位研究郊商的學者指出：1. 以往學者大多因郊商在臺灣各大城市之活躍地位而忽略郊商有很多是「根在大陸而店在臺灣」的福建商人。往來兩岸之間的船隻由此等福建商人製造、經營，承購兩岸貿易品的資金，很多也由之融貸，故於兩岸貿易居於壟斷地位。2. 以往謂此等郊商於西力東漸之後因為不敵西力競爭，加上本身腐化而告衰弛，事實上，以往郊商研究者所用以說明臺灣郊商衰微的證據多半為十九世紀上半葉（清道光年間及咸豐初年）的證據。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臺灣與中國大陸一樣同受世界經濟蕭條影響，而不純粹是西力競爭或郊商腐化的問題。至 1895 年以前的十九世紀下半葉（清咸豐末年至同治光緒年間），則臺灣郊商也分享世界經濟景氣是而更為擴張。此一擴張包括貿易量的增加及商業管理方面的若干現代化發展。3. 臺灣郊商也並不像以往學者所說之於西力東漸之後改而依附英國資本之

下，而與大陸經濟關係式微。清領臺灣後期的郊商非常倚重大陸上的山西票號與錢莊資本。臺灣郊商與大陸的官僚家庭與幕友等非正式官僚體系又有其關連。陸臺貿易數量又有所增加，因而清末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關係是更為緊密而非式微。相對於主張亞洲內部貿易在西力東漸以後更為擴張，中國商人在東亞海域之內居於舉足輕重地位的世界經濟史學者，本文指出：臺灣的郊商與中國、亞洲內部諸多傳統商人一樣同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更為擴張。臺灣郊商與拉丁美洲、中東、部分非洲以外諸多開發中國家的傳統商人相同，發展對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資本市場及本土原有的資本市場的雙重依附關係。來到臺灣的大陸商人係福建地區從事長程貿易商人之一分支，福建商人之貿易網絡自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延展至東南亞，陸臺貿易乃其一環。十九世紀上半葉陸臺貿易因世界經濟蕭條而緊縮的現象是否延及整個亞洲地區，值得注意。在福建地位高低有別的長程貿易商人的頂端係為一些官僚家庭所投資的商行，他們與官府的深厚關係，使其對整個長程貿易居於掌控地位。但也因為這些長程貿易商人與清朝官僚體系的密切關係使他們隨清朝覆亡而衰落。在清政權滅亡之際，亞洲內部的商業勢力是否有過一番結構性的重組，也值得深思。

Sherman Cochran 文探討虎標萬金油企業1910年至1950年間的商業網絡。此一企業開基主人為來自福建永定的緬甸華僑胡文虎。在父親所留下緬甸的一家藥店的基礎上，胡文虎拓展了北至北京，東至臺北，南至雅加達，西至緬甸 Rangoon 的國際企業。胡文虎在擴張其企業的過程中，未曾擔任外商買辦，也未曾學習英文或到過西方，他的經理、僱員多為其永定同鄉，但透過西方商人在東方所示的一些商業行為，胡文虎逐漸走上坦途。他把攜帶、使用不便的中國式草藥改成攜帶、使用方便的萬金油。透過廣告、辦報、從事慈善事業，挨家挨戶兜售，分行經理定期報告業務，其企業聲望亦蒸蒸日上。但其與國民政府及中共政府之間則多齟齬。胡氏先支持蔣氏政權，但因胡借予福建政府之債款未見償還，胡在上海的存款，因戰時通貨膨脹，由三百萬金元跌為一金元，胡遂償而投靠中共政權。其在大陸之企業卻遭沒收，遂又轉而親近在臺灣的蔣政權。不過其在東亞、東南亞的事業仍然欣榮。與諸多華商分別在東南亞政權或蔣氏政權底下遭到壓制，胡的企業則另有發展空間。

杉山伸也有關1895至1930年間英商 Butterfield and Swire 在香港的太古精製糖公司的研究，著重其與日本精製糖公司如何競爭大陸市場。在1895

年以前，太古公司所製精製糖尚可供應日本。1895年之後，因為臺灣供應大日本、明治等糖業公司70%的原糖，又加上日本在1910年以前取得關稅自主權，外糖稅負較重，太古公司盡失其日本市場。太古公司所需原糖另需仰給於非本身殖民地的爪哇，又因太古公司在中國的貸款，索還時間較為短促，也需倚賴買辦中介，不若日本公司很多可以由能够操中文的僱員直接售糖至中國鄉間，1910年以後大日本精製糖公司已取代太古公司操控中國的精製糖價格，直至1932年中國展開抵制日貨運動，太古公司才再領先日本的製糖公司。

Linda Grove 研究1860至1930年間天津因為開放通商口岸而與腹地更為整合的過程。在開港之前，天津是華中、華南的米經運河北運北京的中間站，又為沿海鹽場，與南方的關係較為密切，天津土話多安徽腔即其一例。此外天津乃是北方之一防衛中心，與腹地的經貿關係並不密切，開港之後，內蒙羊毛、駱駝毛大量由天津出口，華北的棉花或進口的棉紗在天津附近製成棉布販售華北腹地，農村產品亦漸由天津出口，天津亦為華北之一金融中心。天津雖為全國第二大港，但與第一大港的上海不同，直到開港之後才與腹地密切整合。

濱下武志「在朝鮮的中國商人（1880-1910）」一文強調東方國家對西方開放的通商口岸，事實上也增加了東方國家之間彼此的商貿機會。此商貿活動多由東方原有的商人或原有的制度所推動。朝鮮自1876年釜山開港之後，中國商人，日本商人，西洋商人互競朝鮮市場。就1892至1893年間之三者人數而言，日人最多，為華人之四至五倍，西人最少，約華人之十分之一。中韓貿易在1883至1925年間約增為三十倍。1893年訂定的中韓條約，除近代條約精神之外，亦仍保有昔日朝貢關係的殘餘。

木村健次則探討日商 Kameya Aisuke 在朝鮮發展之商業網絡。當1876年朝鮮開港之際，很多德川政府所支持的關西商人因得不到明治政府支持，轉而到日本周邊的琉球、北海道、朝鮮發展。Kameya Aisuke 之到朝鮮是其中一例。透過伯叔、兄長牽引、大阪地區資金互助會的資金融通、以前在大阪的店友的合夥關係、以及三井財閥的支持，Aisuke 除了進行日韓貿易之外，也由上海進口棉紡織品至朝鮮，也將業務拓展至銀行、船運、倉庫、電力、燒酒、煙草等方面，除曾擔任朝鮮之人商會會長之外，其財勢尚足以在日俄戰爭之中大力奧援日本政府，但因仍以房地產為最大投資對象，一次大戰後遂隨著景氣不佳而趨衰頹。

Ian Brown 則由一個東南亞研究者的立場來評析此次之討論會。他認為：1. 東亞商業網絡的研究，遠遠超過東南亞商業網絡的研究。2. 在東亞商業網絡的描繪過程中，特別著重透過水域的連繫，其與腹地的關連有待進一步探究。3. 在強調東亞內部關係時，仍不宜忽略西方力量的影響。4. 相對東南亞研究之著重國家力量的探討，這些研究有關國家的影響著墨不够。5. 在東南亞地區，新加坡成為很突顯的商業中樞，其他商業圈則多重疊，東亞地區商業中樞的集中性與重疊性為何，也值得進一步研究。

最後有關米蘭之會如何準備的討論，除抽離出幾大議題之外，更強調得將亞洲地區的個案研究，更一般化而便於與西洋經濟史學者進行溝通。

四、重要議題：商業網絡的持續與變遷

綜合以上各文內容及會場中、會場外的若干討論，這個會議的重要議題，可以用「商業網絡的持續與變遷」來加以概述。

商業網絡的持續可見於霍啟昌、古田和子、Cochran、林滿紅、濱下武志、木村健次諸文。古田和子、濱下武志、林滿紅均描繪出對西方之開放貿易反而增加了東亞各區之間的商貿關係。霍啟昌、Cochran、木村健次、林滿紅更從個案指出東亞本身的商人利用其傳統的同族、同鄉關係擴張其傳統的商業活動，或延展至現代的商業活動。由籠谷直人、杉山伸也二文更見日本商社頗多可以不用藉助買辦而直接進入印度或中國的鄉村購買棉花或配售精製糖。延展至現代商業活動的部分，就各文所示，均只承西方商人之示範作用，而未透過擔任西方商人買辦或到西方來加以學習。這些東亞商人的商業行為 Cochran 認為是介於 A. D. Chandler 所說之 “personal capitalism” 與 “managerial capitalism” 之間。

西方介入造成商業網絡在延續過程中的變異，也可見於濱下武志一文。據林滿紅指出，就濱下所呈顯的資料看來，前往朝鮮的中國商人，來自江浙、閩廣者比例越來越多，來自山東者比例越來越少，因此雖然同樣是中國商人前往朝鮮經商，其間發生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受西方影響而更加崛起的江浙、閩廣商人在朝鮮的地位也有所提升。而就坂本勉、谷本雅之二文看來，則西方造成商業網絡截然的變異。谷本雅之所論及的英國棉紡織品進口來，造成行會以外的新興商人崛起，其情形有似林滿紅文中所提及的高雄陳家，其逕銷南部臺灣糖至日本，是行會商人以外的發展。雖然新興商人與行會商

人有別，仍是本國商人。坂本勉的伊朗例子則指出西力東漸之後，傳統商人完全為外國商人所取代。根據坂本勉指出，伊朗乃一乾燥地區，臨海的港口較少，與日本、臺灣之海港眾多，提供商人更多發展機會不同，而就林滿紅文看來，伊朗正屬於本土資本市場薄弱的中東地區，不若東亞的日本、臺灣、中國，本土資本原較充裕。東亞商人在西力東漸之後，固然有如北部臺灣之局部依附英國資本的現象，但也有如大陸來臺商人之依賴山西票號、錢莊資本、Aisuke 之依賴大阪之資金市場，香港高家之倚賴華資。以故，東亞商人在西力東漸之後即使商業網絡有所變異，並不若中東之發生對西方資本之完全倚賴關係。

除西力影響之外，造成網絡變遷的一大因素是政局或政策的變化。如木村健次所指出，由德川幕府轉至明治政府之際，很多關西商人因為得不到明治政府支持而外移周邊地區發展。又如林滿紅文所指出，與清朝官僚家庭關係密切的大陸來臺貿易商人，隨 1911 年清朝官僚體系之覆亡而衰微。再如籠谷直人所說，日本商人在印度購棉利潤豐厚，1930 年代則轉而不利，據林滿紅指出，如與籠谷直人有關「日印商會」的研究參照思考，可以推測日本政策對日商的利潤變化可能有所影響。就「日印商會」一文看來，1930 年代日本在中國備受抵制之後轉而積極擴張印度之棉紡織品貿易。其擴張之速激起英國反彈。在日本政府退出國聯，國際地位陷入孤立狀態之時，日本乃與英、印妥協，召開日印商會，限制日商在印度之商貿活動。在這次會議宣讀各文之中，唯有胡文虎的跨國企業當其局部企業在若干國家受到該地政府沒收或打擊時，在其他國家的企業仍能進行。

影響商業網絡的因素，除西力刺激、政策、政局變化等等之外，消費市場的貧富情況或其變化也影響商業網絡。如杉山伸也研究的太古精製糖與古田和子研究的蘭開夏英國棉紡織品都以華中全國首富之區為最大銷場不為無因。但全國各區之間的貧富關係也因為對西方開放貿易而有所起落，林滿紅的臺灣研究指出臺灣北部在清末尚凌駕臺灣南部而崛起，很多昂貴物資轉而以臺灣北部為較大銷場。Linda Grove 的天津腹地也在口岸開岸開放之後更加活絡。由此也可以看出像 William Skinner 所說整個商業網絡之中不同等級市鎮間的層階關係 (hierarchy) 並不必然屹立不搖。

附：議程

17 March

<Session I> Chair: Linda Grove

2.00~2.10pm

S. Sugiyama (杉山伸也), 'Introduction'

2.10~4.20pm

Tsutomu Sakamoto (坂本勉), 'The Modern Ottoman Merchants in the Iranian Silk Trade Networks'

Discussant: Sherman Cochran

[Tea break]

4.20~5.10pm

Naoto Kagotani (籠谷直人), 'Toyo Menka Co. and the Japan-India Cotton Trade'

Discussant: Man-houng Lin (林滿紅)

18 March

<Session II> Chair: Sherman Cochran

9.00~9.50am

K. C. Fok (霍啟昌), 'Lineage Ties, Business Partnership and Financial Agency: The Many Roles of a Hong Kong Commercial Network'

Discussant: Sherman Cochran

9.50~10.40am

Kazuko Furuta (古田和子), 'Shanghai: The East Asian Emporium for Lancashire Goods'

Discussant: Masayaki Tanimoto (谷本雅之)

[Coffee break]

11.00~11.50am

Masayuki Tanimoto, 'Who Marketed Imported Cotton Goods? - The Japanese Case'

Discussant: Linda Grove

[Lunch]

<Session III> Chair: Ian Brown

2.00~2.50pm

Man-houng Lin, 'Decline or Prosperity? Mainland China's Merchants Tra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1820s-1895'
Discussant: Takeshi Hamashita (濱下武志)

2.50~3.40pm

Sherman Cochran, 'Sino-Japanese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iscussant: Kazuko Furuta

[Tea break]

4.10~5.00pm

S. Sugiyama, 'Marketing and Competition in China, 1895-1930: The Taikoo Sugar Refinery'

Discussant: K. C. Fok

19 March

<Session IV> Chair: K. C. Fok

9.50~10.40am

Takeshi Hamashita, 'Old Korean Hands: Chinese Merchants in Korea'

Discussant: Ian Brown

[Coffee break]

11.00~11.50am

Kenji Kimura (木村健次), 'The Business Networks of Japanese Residents in Pre-war Korea'

Discussant: Sherman Cochran

[Lunch]

<Session V> Chair: Linda Grove

1.30~2.00pm

Ian Brown, 'Commercial Networks in Asia: General Over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offee break]

2:30~4:30

Concluding Discussion for Milan